

中美脫鉤與全球供應鏈重組 —

高科技管制、產業標準的競合與企業經營策略

盧信昌*

摘要

比對美國政府部門的記者會、國安咨文報告與 2020 年總統大選期間的競選文宣，本文嘗試梳理其論旨的異同；尤其會對國際企業布局與全球供應鏈的可能衝擊。進一層，則要探討企業決策與產業調整，包括在工業標準的跨國分隔、群聚效應被迫做成的地理重組與消費市場的分流，最終針對渠等的戰略思考，可推演的參考依據、關鍵衝擊、決策因素和做成應對的必要調適。

關鍵字：心志一同的價值鏈、競合策略、產業標準、中美脫鉤、逆全球化

壹、前言

晚近以來的美國政局，從川普團隊標舉起「美國第一」的愛國旗幟，並於就任之初簽署行政命令，退出太平洋經貿夥伴協議(TPP)與巴黎氣候協定；繼而對進口品項開始反傾銷調查，與一連串在國安危害下行政處置。因此而被開徵反傾銷稅與國安關稅的品項，遍及鋼鐵、鋁製品、汽車和橡膠輪胎等產品，掀起二十一世紀初的反全球化序幕。

期間更不惜藉助輿情操弄與國際場合的媒體聚焦，像是利用 2016 年的里約奧運、2024 年的巴黎奧運，特定媒體與美國游泳選手數度聲嘶力竭，他們的無故指控，拒絕與有禁藥嫌疑的選手握手致意。甚至是同台競賽，還擺出睥睨不屑的神情出席領獎。後冷戰世局，一度得以讓政經體制做良性競爭的空間，如今竟漸次轉成強權備戰的對峙關係！

傳統經濟理論，跨國投資會導致要素報酬的漸進均等化¹，單純的趨勢發展與各國企業做集體選擇的結果；如今竟能成為愛國與否的表演藝術。為了總統勝選的政黨考量，硬將美國製造業在過去三十年間，其就業占比從約近二成，漸次減為僅一半高的一成出頭，悉數歸咎於是美國的高薪工作，被國外競爭給搶走。職是之故，合該用技術輸出與跨國工資差異來做解釋的生產外移現象，用研發投入與技術突破的良性對抗；如今，阻卻不公平的跨國競爭和逼迫高科技業者的投資回流，早已成為美國兩黨所爭相表態的政見訴求與政策規劃。

*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¹ 請參看：Lucas(1990)，關於生產性資本的跨國移動和顯然並不充分的模型解析。

進一層的分析，如何避免美國主控世局的大權旁落呢？尤其在高科技的價值鏈、金融能見度與外資的吸金能力上！無論產業的據點或融資取得方式，雙方競比，原本可從技術推廣與突破速度，到有無分潤共享的互惠善意；如今都被放大做檢視，因而成為中、美要持續脫鉤的新冷戰！

即使面對主要盟國的不解和公然反對，川普政權仍然以拒簽 G20 領袖宣言和退出數個國際組織，來凸顯其走向單邊主義的決心。在 2019 年舉行的 G7 和 APEC 領袖會議上，更不惜當場掉頭走人；不僅接連退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國際教科文組織(UNESCO)，即便在全球疫情最為慘烈之際，美國政府仍就預告要退出世衛組織(WHO)。

川普種種不顧國際慣例的極端作為，其所引發的動盪至今未被消弭。川普政權所開啟的脫序演出，嚴重影響區域和平的維繫，重挫了全球化與地緣政治，曾經難得的關聯。各界不免擔憂美國世紀的結束，會否成真？一旦全球政經掉入失衡狀態，會否引爆新一輪熱戰呢？於民主陣營內的投機倖進，不惜對抗者有之；但晚近被迫選邊站隊的恐慌，更不絕於耳！²

以下行文，先就拜登總統任期間的內憂、外患與政策回應，做一羅列整理；再就其競選政見、團隊組成與作為主張，嘗試推演其政策方向與出牌更張等的決策考量。最後，結合晚近的區域局勢與全球發展需要，同時就疫情後的世局安排，據此談論國際企業所面臨到的經營環境變動、前瞻擘劃必要性，評估可能的國際共識與抉擇選項。

貳、比對世局演繹的案例，看中美歷史過往與軍、經戰略

「美國第一」的主張，並不新穎；甚至常常是以退為進的戰略構想；一如川普堅持要從國際組織與全球條約，都做退群的選擇！早在 2018 年的瑞士達沃斯峰會(Davos Summit)上，川普總統曾即席就「美國第一」的主張做發言；他強調不只是美國，所有國家的首要任務，都在維護本國利益；至於如果因而發生重大衝突，日後他倒很樂意幫忙做調解！

此外，由強權國家所主導多邊架構，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迄的基礎規則，如今則已退縮為是各自要強的實質干擾。然則，隔山觀虎鬥的姑息旁觀與惡意搔弄，不正是爆發太平洋戰爭之前，美國未能積極追求對外擴張影響之時，所慣常採行的立場啊。

² 請參閱：“Singapore PM: 'Considerable risk' of severe US-China tensions”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56318576>

有趣的觀察是，隨著 2021 年初的政權移轉，由拜登總統指派接替的外交與國安人士，其公開談話與國際穿梭的立場展示，並未走出由川普策士所設定的框架，「美國第一」的主張。最明顯案例，自然是該一年春天在阿拉斯加，舉行中、美外長層級的會談，一舉將動盪發展給充分揭露。³令人費解的是：為何政黨輪替與後續逐步展開的政局新演繹，經常在人民滿懷期待的票決之後，仍然敵不過當權者的剛愎自用與刻意扭曲呢？

而即令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酷戰禍，由美國總統威爾遜在當時所倡議，並得到來自英國、法國與義大利等國的大力支持，成立國際聯盟來處理全球爭端；最終，卻在維也納和約行將議定完成的當頭，被美國國會所徹底的否決。⁴

當時候，美國國務院透過駐節東京的美國大使，持續探詢日本內閣官員，其於山東二十一條的真正意圖；並轉達、說明威爾遜總統的立場。⁵可直到珍珠港事變發生以前，美國都不願介入日本侵華戰爭。但美國內部普遍奉行中立主義，因而也放棄參與國際聯盟；當然，就更無意願要來貫徹其於中國主權完整的立場；遑論要與日本和歐洲國家做徹底的決裂，促成強國一起，放棄渠等的在華利益啊！

回溯五四運動的背景，在第一次大戰之後的巴黎和會上，日本提出繼承德國在華利益的山東二十一條。遺憾的是，美國威爾遜總統於親自出席巴黎和會的當時，雖然表示其對日本侵華意圖的擔憂；更不信任日本政府在條約的遵守意願。

再則，根據已解密的美國國務院外交電報檔案，可以看到於淞滬戰役爆發之後，美國駐南京大使館代表已研判日本會全面侵華；理由是，日本並未遵守門戶開放政策，竟然敢在漢口，任令日本駐軍對美國商船隊，強行登船做檢查。他還告知國務院的上級長官，當時國民政府的工作對口人士，一位負責工商事務的部長級要員，即已透露國民政府欲遷往大後方，決心長期應敵的戰略大佈署。

³ 請參閱：「中国人吃的就是“这一套”」，<https://www.voachinese.com/a/us-china-position-of-strength-03242021/5827805.html>

⁴ 請參閱：“I can predict with absolute certainty that within another generation there will be another world war if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do not concert the method by which to prevent it.”，<http://www.woodrowwilsonhouse.org/league-nations>

⁵ 請參閱：Kawamura, Noriko. "Wilsonian Idealism and Japanese Claims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6, no. 4 (1997): 503-26. Accessed January 10, 2021. doi:10.2307/3642235.

https://www.jstor.org/stable/3642235?seq=24#metadata_info_tab_contents

只是長期浸淫其間的政治人物，其信念與價值飆高，卻很難在短時間內，被一一導正的！畢竟，由威爾遜總統迄今一百年間，諸多美好成就與理想訴求，無論建構成國際的多邊體系、軍事行動的聯合阻絕，與在國際義務的承擔！對比一整個巴黎和會當時的外交穿梭，以及主要國家在日後必須集體迎戰法西斯主義，像是淞滬戰役的發生；以及南京國民政府所不得不然，針對時局的應變與全面焦土的拖延戰略。⁶

眼前，當川普總統的前副國安顧問，博明，他一直有關於中國事務的發言，也不過在玩弄史實與濫用華麗的辭藻。中美關係，淵源確實很深厚，不論在民間的經貿往來與來華傳教的熱誠；而他雖然也滿口標準的普通話，卻仍置過往的血淚教訓與戰爭危害，全然於不顧啊。

晚近，學界有專家以所謂「後事實」，也就是假細節穿插與內容變造，新聞界於經營輿論的朦混手段；於政治事件的操弄者，都只是雕蟲小技！世局領導人物，惟其能夠審慎檢視和磨合各方歧異；更有在理想色彩的堅持，方才能避免人類會有重大災厄與衝突的重複發生。

在甫上任的前二個半月之內，拜登團隊即能通過國會的重大預算案；依舊要以總統的行政命令，或是以黨派藩籬的明確界線化，取得的強度關山。因此之故，拜登團隊一貫的勇於任事，那怕在 2024 年的候選人資格，也都能大義滅親，共同扛起歷史重擔與堅持理想的實現。可欽、可佩。

事到如今，拜登團隊既要除去被川普的選戰操作，所進行誣蔑的標籤化、妖魔化；川普總統透過長期指控，讓建置派菁英只是華盛頓沼澤內的鱷魚。川普擅長於罔顧民主精要與科學事實；但的決策風格，卻有可能再次贏得選民支持。⁷ 鑑往亦可知來。如今的美國社會，卻一個勁的掰弄「後事實」的愚民手法，做成過度穿插的誤導民眾與有目的的解讀；今昔種種，又豈不令人扼腕三嘆啊。

⁶ 請參閱：“Japanese interference with American treaty rights and with equality of commercial opportunity in China”

<https://1861.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39v03/ch3?start=61>

⁷ “At the summit, we will set an ambitious transatlantic agenda for the future to reinforce our unity and solidarity and ensure we remain strong both as a military and as a political alliance; to broaden our approach to security by strengthening our resilience, preserving our technological edge, addressing the security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and working more together; and to take a more global approach by protecting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which is being challenged by authoritarian powers like Russia and China.”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and-nato-secretary-general-jens-stoltenberg-before-their-meeting/>

川普總統雖曾是敗軍之將，但終究得到過七千三百萬票的選民支持；而美國國會的總統彈劾案，也船過水無痕。眼前有了川普復出，於政策更張與政治手腕的收放，拜登團隊絕不能忽略可能的反彈與黨派分歧，以及於執政穩固與各類政策的推行，所可能再次產生的重重限制！

叁、拜登路線所代表的經貿方針與政策時程表

遺憾的是，金融海嘯以迄的慘烈與現狀衝突下的民粹心思；再加上社媒與政客所操弄的「後事實」，讓仇外恐慌與剛愎自負的激情，總能被雙向做強化。當前反全球化的呼聲日益高漲，而量化寬鬆的通膨隱憂，也蠢蠢欲動！現下的爭議，既有政府職掌的再確認、貿易機制以及外來投資的開放與招攬對象；更有在國際條約的遵守與全球和平的嚴肅承擔。

像是川普、拜登的世紀對決，號稱是有史以來輸贏最大的一場選舉，雙方差距更在五百萬票以上；然其背後所反映出的階層對抗、族群撕裂與政經鴻溝，其社會基礎則頗為明確、深遠。即令總統拜登取得完全執政的政治基礎，但其所嘗試的對內和對外彌合，任務則頗為艱鉅；尤其是提振經濟信心與全球多邊架構的運作挑戰上，卻也是無可逃避的重責大任。

一、拜登的選材用人與競選政見的落實

如何弭平金融大海嘯以迄的信心危機，與過度透支的金融貨幣化呢？包括內部的就業減少與資產膨脹的傷害，尤其有通膨危機的叩門？又要能修補美國第一的暴走，所開啟的經貿衝突與惡化的盟邦信賴呢？

首先，可以慶幸的是，「美國第一」的主導與空轉務虛，傷害已現；更在激進份子佔領國會之後，已然失去主流階層的支持。反之，陸續表態的全球大企業，不僅能理解拜登當選的民意展示；更主動回應社會對企業作為的有所期待，將能適度的「以商領政」。除了大額捐款與去向的透明化；像社媒帳號和雲端儲存的使用、租用，都不再依託言論自由的保護之名，反而被特定族群和野心家，所能操控和保有的特權禁攔。

其次，國際經貿事務能再度回歸常軌，不再無端的做敵我分別，以及有政治指導下的生產鏈大裂解；才能讓美國的「再度工業化」，能有共識和決心得以漸進增溫、完整落實。例如，拜登團隊主張綠色新政；過往在其副總統任上，基於環境生態考量更反對從加拿大艾伯特省一路到德州休士頓的運油管線。即使在第二場競選辯論上，於川普總統的高聲逼問之下，總統競選人拜登依舊明

確回應，強調願意以漸進的時程表，讓美國經濟過渡到不再依賴石化產業，他選擇一條穩健且長遠的路徑圖。

換言之，善於折衝協調的拜登此刻也有鴨子划水般的輕盈，早已整合好各方的利益衝突，才能在競選會上公開闡明其對於油管興建與頁岩油開採，等等的爭議立場。尤其新冠疫情的衝擊考驗，拜登團隊於競選期間，即明確表述在生醫科技產業上，進一步主張相關產品線與原物料的就近供應。透過公部門醫療預算與緊急備用的庫存採購，以公務開支讓在美國境內生產，享有優先議約權和政府的長期支持。

再則，總統當選人拜登的內閣已陸續通過聽證投票，其共同特色是：專業資歷完整，且符合少數族裔、新移民等的出身；更有近半的比例是女性和在過往與拜登有共事經驗。就中財政部長葉倫女士，最為人所關注；在 2018 年結束其聯準會主席任期前一天，葉倫女士出手收治了美國的富國銀行，就其違反內控和風險管理的涉嫌，做成改正的要求。

在意識到金控業者的潛在傷害，尤其對顧客權益必須增加保障；要求富國銀行在改善風險管理之前，不得擴大資產的持有規模和遵守縮減資產的規範。一度被認為鴿派的葉倫女士，因為此舉的臨去秋波而聲名大噪。於此際，經濟信心的維持與融通消費開支的必要之下，如何讓金融業者意識到所該配合的社會責任？顯然，已無法單純仰賴道德勸服的老路子。

二、拜登總統的政治手挽與領導風格

拜登總統迄今所展現的柔性領導風範和百日維新的優先次序，緊要訊息即在傳達出其任上的困頓險惡，和做成人心安撫必要。例如，農業部長即由愛荷華州前州長，Tom Vilsack，他也是歐巴馬前總統兩任上的農業部長，再度回鍋擔綱；即使拜登並未能贏取該州的六張選舉人票。有趣的對比是，曾經以全票通過任命案的農業部長；於擔任將近八年的同一職務，此番依舊以 92 比 7 的懸殊差距來獲得支持，可以算是政通人和了。

拜登用人，明顯考量了族群平衡與專業歷練；而其政策立場，也頗有在選舉前、後的一致性。尤其在政策推出時機的拿貼，穩健且能配合時局的發展；無論在民意探詢與團隊共識上，均能精準控盤且高度合乎社會預期。至於在中美貿易戰以來，如何有效分派聯邦補貼？更在新冠疫情之下的民生消費，如何能進一步引導農民與食品加工企業，願意配合做好佈署和提升緊急因應能力呢？凡此種種的發展與安排，總能探得拜登總統選才用人，以及在政策推動上，優先順序的幾分深意。

與此同時，伴隨著美國再工業化的追求與勞權維護的聲浪，美國需要有產業政策的主張也再次浮上檯面。像這樣的社會情緒，不僅普遍浮現在第二次石油危機之後的美國政壇；更是促成川普迅速竄起的社會基礎。

眼前，總統大選紛擾再次塵埃落定，但量化寬鬆做融通的後續影響，發展實屬難料；尤其是對資產市場的交易信心、就業的恢復與可能失控的通貨膨脹。此外，尚有美、中戰略對峙等不確定性在其間，種種因素都逼使國際企業主必須調整其決策風格與佈局時程。

特別是在全球生產鏈的解組與異地重建，關於跨國企業的轉進到第三國，所謂「心志一同('like-minded')」的生產鏈；或是跨國企業選擇回流母國的投資布局，諸多生產網絡的轉折更替，都將造成重大衝擊；尤其是在高科技業的轉移嘗試，首要對抗的卻是仰賴甚深的深度分工與群聚效應。

更在此刻，全球經濟無論在投資形成與就業創造，都需要有另一番的規劃指引，以避免各國政策的限縮而有躁進犯錯的發生。誠然，依循市場力量與政治指導的相互辯證，在高科技業更多了幾分國安考量；尤其是在晚近，中美雙方交惡的歷程，參雜其間的戰略思考與相互回應。國際企業不是主動串連做遊說，和力陳其維護現狀的必要論述；就只能在日漸成局的戰略方針之下，被迫屈從和追隨新的戰略指導。

三、中美脫鉤的政策博弈與企業應對

二十一世紀以迄，盛行 FDI 往新興國家的移動；誠然，因為貿易順差的外匯持有，管理操作需要，也會有反向的資金移轉發生。已經行之有年的生產鏈專業化與分工程度，一旦因為中、美脫鉤而被迫下降；同時，為能阻止對方限制出口與在採買上頭做設限，因而必須擴大研發支出和進行重複性投資。於此時，全球 GDP 的成長潛能與實現，必然要趨於萎縮。

到中國大陸的外來投資，根據學者按照受益身分的公民別所做的晚近研究，參考 (Coppola et al. 2020)，美國到中國的直接投資極有可能嚴重低估，大約在六千億美金之譜。

一方面，此一推估金額遠比名目有登錄的，高出四倍之多，顯示各類節稅與避稅行為很普遍。另一方面，Lucas(1990)的探討，則認為相對於兩地的資本生產力差異，流往新興國家的資本似乎顯著的偏低，因而有過「盧卡斯就 FDI 的矛盾觀察」，引發後續研究探討。

然則，中、美兩國於各自調整完成之後，該兩國的 GDP 仍可能增加或僅只些微的減少；此一部分的重分配，涉及到其他居中於生產鏈與貿易國家的發展影響。可以確認的是，其他盟邦與主要的貿易往來企業，還可能因為中、美雙方的拉鋸和要被迫選邊，非常有可能跟著受害，這包括在：高獲利的市場銷售會被迫轉向、生產規模的壓縮變小，以及因為分散庫存的要求或是發生重複投資，之後必須有的成本吸收與分攤增加。

有趣的觀察與推演討論，可能在以下的幾個關聯面向上：

- 一、歧視性對待之下，所採取的交易限制與非經濟的產業傷害；
- 二、因應政策規範下，必須遵循的政治指導與生產鏈的大調適；
- 三、等同禁運效果的關鍵處置，阻止新品牌的信譽建立和競爭；
- 四、確保智財權的海外維護，擴大屬地概念的司法領域和範圍；
- 五、透過商業利益的打壓，進行對其他主權國家的制裁與管控；
- 六、減少中間財與設備提供，去中(美)化的來源轉向和技術轉型。

大抵而言，美國的再工業化期望能創造就業，因此其投資會是往下游做成的生產整合；而大陸的品牌經營與一帶一路政策，則將往產業加值鏈的上游進行，包括開發設計能力的延展與在關鍵材料的控制取得，以及往加值鏈下游，做成消費品牌的口碑經營與參與在跨國市場的末端銷售。

究其實，日本內部的財閥分立與長期的關係互動，泰半有各自為政的地域切分情況。固然，這部分是居於戰後的和平憲法，考量如何有公平競爭與阻止軍國主義的復燃控制，因此造成生產鏈切割與地域市場的分離。各自專擅的經營，究竟利或弊呢？從競爭強度的不足，但能保有多元的設計選擇；到因為重複投資而提高規模成本，哪個向度會多一些權重呢？

誠然，多方取材、分區授權、平行研發的狀況，在美國也是有的；但在資訊流通與人才交融以及跨域市場的競爭，在美國則非常普遍。反觀，中國不斷強化其規模效益，因此在各方面都做到較低的地域屬性，於階層與地域區隔少，而保有充分流通。

在中、美脫鉤的影響帶動下，減少流通和原有的強化競爭，當然也壓縮到過往所慣有的規模擴充；之於在地域市場分離之後，因而做成在異地備援的支持作用。究竟對全球國家而言，意外狀態的緊急應對和避免生產的過度集中風險，會否潛藏有實質效用與未來作用的想像呢？

最後，過往努力促成擴大分工和專業生產，而有的平行分散與競爭，跟垂直整合之下的利與弊，充分取決於競爭強度、規模效益的大小與專業化之後的集體應變能力，總總都能反映成是對成本的影響，更將決定中、美脫鉤之後的世界發展。無論如何，其他國家則要被迫選邊，或是被迫要兩頭燒、加倍做投資；既喪失自外於強權的政治牽扯，加上後續的勒索威逼。在倍多力分之下，總和其全面影響，明顯只會是輸家了。

肆、結語與建言

無論街頭示威或境內的恐怖主義，從美國到南半球的紐西蘭都發生；對比起經歷北非之春，難民潮衝擊的歐陸國家，此刻的人心動盪正盼望能有同舟共濟的決心，以及有風範的前瞻式領導。晚近十年間，拜登總統和已仙逝的國會老戰友，共和黨的馬侃參議員，他們跨黨派做成攜手合作，像是通過歐式健保，正是能堅持理想的菁英領導。

反觀，川普意圖阻絕外來人口，搶建美、墨圍牆好爭取時間，讓美國內部的族群融合與歧見弭平有機會；川普也大力支持英國脫歐，首相強森的強勢談判與拒絕履行承諾的投機，在歐盟內部帶起新一波的分裂仇恨。誠然，單靠美國市場的對外開放，仍不足以擔當起全球的經濟火車頭；尤其要面對來自區域經濟夥伴協議(RCEP)和中、歐投資協議(CAI)簽訂後的貿易轉向與資源競奪。

更何況美國再工業化和基礎建設的投資目標，歷經過三任總統之後，縱然方向已然明確，卻依舊要面對到調升最低薪資與富人加稅的立法程序與拉鋸刁難。即令一切都順利成真，但對於企業海外生產鏈的回歸美國，重新布局的考量會否橫生攔阻呢？都需要有持續且客觀的分析調查。

至於歐盟、美國與中國大陸，未來的三國互動，究竟會做成相互的拉抬？抑或持續帶有惡意的競爭呢？都有待拜登總統的後續作為與政策來釐清。慶幸的是，僵持近兩年的世貿組織秘書長，Dr. Okonjo-Iweala，也是非洲國家的首次人選，終於取得拜登政府的首肯放行；而回歸世衛組織、氣候峰會與國際人權組織等，拜登政府業已表明在責任攤派的承擔意願。

參考文獻

- Coppola, A., Maggiori, M., Neiman, B., & Schreger, J. (2020). Redrawing the map Of global capital flows: The role of cross-border financing and tax haven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6855.

Lucas, R. (1990). Why doesn't Capital Flow from Rich to Poor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 92–96.

On strategic use of Co-opetition and industrial standard in the hi-tech sector: the need to restructure global supply chains by relevant players amid US-China decoupling and Post COVID-19

Hsin Chang Lu*

Abstract

The current response by main countries to the crisis of Covid-9 is to double down whatever methods adopted during the financial tsunami occurred between 2007 and 2009. Nonetheless, the overshooting of financial markets worldwide as well as a rapid increase of corporate cash reserves may indicate the opposite. Recently the sharp rise in yields and increasing inflation expectations forced the Federal Reserve (FED) to change tone over monetary stimulus. Compared to last crisis, the contrast then and now shows the lack of physical investment and collective fiscal expansion willingly, both at the country level and by key companies.

That businesses may interact under “co-opetition”, taking simultaneously competitive and cooperative activities, was recognized formally near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A further complication to most multinational firms is the chance for US-CHINA decoupling throughout the crisis of COVID-19. It would be striking to hear of a similar position proposed by President Biden. The president made his first diplomacy speech on February 4th, 2021 and said that “But we’re also ready to work with Beijing when it’s in America’s interest to do so. We’ll compete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by building back better at home and working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he emphasis of resilient production and concern of national security has led to a push to restructure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Newly announced executive order by the White House is to conduct a 100-day review of four key industries and a yearlong review for six product sectors, covering defense, public health, information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portation, energy and food production. Thereby,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tackle the following issues by multinationals on every front:

1. How will design of supply chains and direct investment be affected out of the US-China Decoupling, both vertically and horizontally?
2. How will decoupling impact China's technology advancements and her long-term economic policy, say the so called “dual circulation strategy”?
3. Can we look for a silver lining out of the great rivalry?

Keywords: Like-minded Value Chain, Co-opetition, Industrial Standard, US-CHINA Decoupling, De-globalization